

杜維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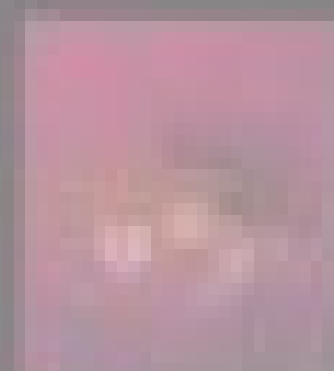
現代精神與 儒家傳統



現代精神與

儒家傳統

陳其南



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

杜維明 著

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

1996年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80元

2003年5月初版第六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杜 維 明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5 5 號

台 北 發 行 所 地 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 話：(0 2) 2 6 4 1 8 6 6 1

台 北 忠 孝 門 市 地 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F

電 話：(0 2) 2 7 6 8 3 7 0 8

台 北 新 生 門 市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 話：(0 2) 2 3 6 2 0 3 0 8

台 中 門 市 地 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 中 分 公 司 電 話：(0 4) 2 2 3 1 2 0 2 3

高 雄 辦 事 處 地 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 話：(0 7) 2 4 1 2 8 0 2

郵 政 劃 撥 帳 戶 第 0 1 0 0 5 5 9 - 3 號

郵 撥 電 話：2 6 4 1 8 6 6 2

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責 任 編 輯 鄭 秀 蓮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1448-9(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 / 杜維明著 .

--初版. --臺北市：聯經，1996年

486面；14.8×21公分 .

ISBN 957-08-1448-9(平裝)

[2003年5月初版第六刷]

I. 哲學-論文, 講詞等

前 言

1988年5月20到6月29日我應臺灣大學哲學系和歷史系的邀請，以“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為題，開設了一門由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經費，只需滿足兩個學分的“濃縮”課。演講每週一、三、五晚上六點半到九點半在具有空調設備的文學院會議廳進行，共十三次：

- 5月20日 軸心時代的涵義
- 23日 韋伯：資本主義的興起
- 25日 現代西方的動源
- 27日 柏深思：現代化的多面性
- 30日 美國的生命形態
- 6月1日 哈伯瑪斯：理性的透視
- 3日 從解構到重建
- 6日 現代主義的挑戰
- 20日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 22日 工業東亞的興起
- 24日 傳統的生命力
- 27日 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
- 29日 新軸心時代的必要與可能

選修的同學主要來自臺灣大學哲學、歷史、外文、中文系的三、四年級本科，也有臺灣大學及清華大學的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旁聽的則除在其他院校就讀的同學之外，還有不少社會人士。

5月20日開講的那天，正逢“黑色星期五”——因農民到立法院請願引起警民衝突，造成二二八慘案以來最嚴重的流血事件，直接影響臺灣政局，也意味著中華民國正走向解禁和全方位民主化的道路。5月23日應蕭孟能先生之請為《文星雜誌》寫了一篇〈從根源處設想！〉的短文，提筆時並沒有料到這一設想竟刊在《文星》告別文壇的專號中。1988年夏季是臺灣步入百無禁忌，誰也不怕誰的開放社會的關鍵時刻；也是嚴肅的文化雜誌紛紛被股市、娛樂、運動和靈修等刊物所取代的轉型期。還記得6月28日參加了《當代雜誌》成立兩週年的慶祝酒會並和金恆煒、張文翊、李永熾、方瑜及錢新祖談起在政治極端化和經濟商業化兩股潮流衝擊之下，進行深沉人文學反思的艱苦。

旅居臺北期間，曾到香港參加儒家和基督教對話及華人經濟及政治現代化兩個學術會議，給我一個從多層次、多向面、多維度和多因素的視野來考慮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和現代精神的儒學詮釋的機會。離臺赴港是6月7日，濃縮成十三講的短課已作了八次報告，但只把我所了解的現代精神給予宏觀的點題而已，心裡頗有掛一漏萬的失落感。在香港期間和神學家如衲佛(Robert Neville)、格優基(L. Gilkey)、伯爽(J. Berthrong)及沈宣仁論學較多。深覺我因順著韋伯－柏深思－哈伯瑪斯那條思路來談現代精神，對希伯萊和基督教的傳統只輕輕帶過，也不能深扣精神性的課題，是一大失誤。

另外，我那時雖對體現當代西方學人自我反思最深刻的三大

思潮——女性主義、環保主義和宗教多元主義已略有所窺，對由福科(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及布杜(Pierre Bourdieu)幾位法國智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研究也產生濃厚的興趣，但要到1990年代在巴黎的高深學院講學時才稍能對所謂“後現代論說”有所認識。因此6月3日的“從解構到重建”那一講只點題而已，根本沒有擊中要害。這也許是因為我對承繼新左翼的餘韻而大談後現代主義的美國學人，如詹明信，缺乏好感的緣故。我雖充分肯定後現代論說在寫出種族意識，如郝爾(Stuart Hall)和性別意識，如史必伐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貢獻，但我對自居“邊緣”而狠批資本主義，但言行卻處處暴露“主流”霸道而且極為傲慢的人生態度則大不以為然。因此我對“從解構到重建”一講因錄音機失靈沒有保存並無悔恨之意。

其實，我能到臺灣的高等學府和哲學界及史學界的同道論學已感到機遇難得；本來並沒有作成記錄的構想，更沒有集結成書的奢望。如果不是孫震校長撥出專款，文學院朱炎院長特別關照，哲學系張永雋主任及歷史系徐泓主任組織研究生為這事操勞，《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絕無從空口騰說轉化為書寫文字的可能。

不過當時隨興之所致而宣洩的情懷逐漸凝結成白紙黑字確實經歷過一番辛苦，我自己也投入了大量時間、消耗了許多心血，其中滋味不足為外人道也。首先我要感謝那幾位參與其事而堅持不肯具名的工讀生，他們的筆錄為這本書稿準備了素材。在哈佛大學從事科研的林同奇教授根據修定本詳閱一過，改正了不少錯誤。周勤女士(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曾任教深圳大學中文系，現在哈佛大學東亞系攻讀中國思想史博士學位)把全稿

校閱後輸入電腦，而且還為了閱讀方便添加了好些註釋。沒有他們的鼓勵和支援，我既缺乏出書的意願也不具備成書的條件。我感謝他們的協助，但必須申明，一切文責概由我個人承擔。

最後，應當指出，這裡所記錄有關“現代精神”和“儒家傳統”的觀點反映了我六年半前的思路。經過天安門的悲劇、柏林圍牆的倒塌、蘇聯的解體、歐洲整合的進退失據、美國後工業社會的矛盾加深、日本的經濟失調、亞太地區的軍備競賽，和非洲的浩劫，世界秩序正在重構。我們不僅對現代精神要重新理解，對現代性也要重新定義。在“儒教文化圈”之中，日本朝野正對明治以來即成為共識的“脫亞入歐”政策進行全面反思，為回歸亞洲鋪路；大陸面臨改革開放所導致的史無前例的商業狂瀾，發掘儒家倫理資源以重建道德規範的呼籲已屢見不鮮；香港因九七大限而激發了許多如何保障自由，如何確立法治的議論，和新加坡的政治領導以“亞洲價值”抨擊西方人權論說，形成鮮明的對比；南韓和臺灣民主化為儒家式的市民社會，乃至具有“儒家特色的民主”，拓展了新境地；越南和北朝鮮也逐漸改變社會主義路線而對工業東亞、北美、歐體乃至殖民時代以前的儒家傳統採取兼容並包的開放態度。這些新趨勢、新動向為儒學的第三期發展提供了許多值得深思的線索。我擬在〈後記〉中把近年探討這類課題的情況嘗試著作一扼要的說明。

杜維明

1995年農曆元旦康橋蘭衲書齋

目 次

前 言	i
第一講 軸心時代的涵義——引言	1
儒學傳統在中國文化區的現狀	3
反思的三個基本前提	12
軸心文明與儒家傳統	29
第二講 韋伯：資本主義的興起	43
韋伯和韋伯學	47
韋伯和比較文化研究	51
價值取向及其文化意義	59
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	69
思維盲點與理論典範	72
第三講 現代西方的動源	77
韋伯的精神資源	77
西方文明發展的動源	82
文化模式間的差異性	94
對中國文化的照察	99

第四講 柏深思：現代化的多面性·····	107
柏深思學術研究總體觀·····	108
柏深思思想的三個源頭·····	115
柏深思的社會分析模式·····	122
從柏深思模式看儒家傳統·····	132
柏深思主義的危機·····	152
第五講 美國的生命形態·····	161
美國社會的基本結構·····	161
美國人的價值觀和文化觀·····	171
美國當代的危機·····	184
文化層和社會層的斷裂·····	193
第六講 哈伯瑪斯：理性的透視·····	199
哈伯瑪斯思想產生的背景·····	199
哈伯瑪斯及其思想來源·····	206
理性思想的線索·····	218
第七講 現代主義的挑戰·····	241
當代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	242
西方理性主義的限制·····	259
儒學的創造性轉化·····	275
第八講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289
列文森的挑戰·····	295
傳統的危機和全盤西化思潮·····	302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314

傳統與中國知識分子	325
第九講 工業東亞的興起	329
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因素	330
對儒學傳統的重估	342
東亞社會的同構現象	350
儒家文化和工業東亞	360
第十講 傳統的生命力	375
尋根意願的現代涵義	377
儒學的內在超越性	385
知識精英與中國政治	397
第十一講 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	411
儒家傳統的起源和發展	411
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	419
儒家傳統的限制及其創造性基礎	428
第十二講 新軸心時代的必要與可能	439
軸心時代的價值動態及其文化載體	443
現代精神再檢討	446
工業文明中的矛盾現象	453
第二軸心文明的可能性	458
後 記	463

第一講

軸心時代的涵義——引言

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有這個機會。對我來說，“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這個課題目前尚屬發展階段，許多構想還不夠成熟，運思也不夠嚴密。這次能和大家一起討論這些思考過程中的觀點，對於進一步深入這個課題是十分難得的機會。

這次我原來的設想是一般性地討論儒家哲學的各種不同問題。大約十三、四個月以前，我就開始考慮用什麼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把儒家哲學的問題擺在比較文化研究的背景下，跟大家交換意見。我覺得非常難處理。這個課題不僅層面很多，接觸的問題非常複雜，而且我個人對這些問題所作的思考，一方面受到思想上的一些阻力，這是我個人學力所限；另一方面也引起中國大陸乃至工業東亞和北美一些學者的反應。有一些人對我的觀點從同情理解的角度加以批評；另一些則反感情緒非常強烈，特別是中國大陸年輕一代的反應。所以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可能完全作一個客觀的分析者。因為在某個層次上講，不管我願意與否，我已成爲一個內在的參與者，因此有強烈的主觀意

願。這個主觀意願當然會影響到我對問題的分析，以至可能出現偏差。這是一個困難。所以，在今天的第一次討論中，我想把自己所確認的一些困難，以及我思考這個問題時的背景，作為引言先提出來。用中國大陸學者的說法，這使大家對我所討論問題的背景所屬的“參照系”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可以為深入批評以及進一步研討的時候，提供便利條件。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起初我想從傳統和現代這個角度來討論儒家哲學所面臨的一些課題。但經過一些反省以後，我覺得應該把這個題目反轉過來，即先把它的存在意義從廣度和深度這兩個層面提出來。因此我把所謂現代精神這個課題作為我們討論儒家傳統的現代命運以及發展前途的背景來了解。這中間最大的困難是我目前尚在思考的過程中。所以這次演講並非把我經過長期研究醞釀所得的成果通過這一系列的演講公諸於世，讓大家了解，而是請大家和我一起思考。這中間會有不小的冒險性。

這種類型的課在美國很普遍，可是在中國文化區，據我所了解，不管在中國大陸還是在工業東亞，甚至在新加坡(南亞比較例外)，多半教授要開課的話，都是開他自己最熟悉的東西，而且是經過長期醞釀所得的智慧結晶。有時他的講稿都已經寫好，可以根據講稿把他詳細考慮後的問題，通過一個有系統的方式陳述出來。而我這次來，可說是赤手空拳，只是想藉這個機會，把我思考的一些觀點提出來。這個過程本身具有不能預期的變化。譬如說，在下次討論的時候，到底我對馬克斯·韋伯¹的觀點應該採取什麼樣的運思方式，應該有什麼樣的結論；對於柏深思²所提

1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著有《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經濟和社會》、《宗教社會學》等。

2 柏深思(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國社會學家，自1944年起

出的問題，乃至哈伯瑪斯³所提出的問題，應該作怎樣的評價，怎樣把它和我現在所思考的有關儒家傳統的問題聯繫起來，這些都有許多變數。不過，貫穿這一系列的講座，我覺得有一個中心的課題，簡單地說，就是能否植根於儒家傳統，面對現代人存在的問題發出有哲學意義的洞見。這並不是說我已經有了一些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洞見。這是一個挑戰性很大的課題，一個對於任何關心中國文化發展前途的人來說都應該關切而且意義深刻的課題。

儒學傳統在中國文化區的現狀

五四以後，反傳統主義達到高峰。此後又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尤其是中國大陸的馬列主義掛帥，乃至文革，又經過各種不同的文化思想上的斷層，今天，1988年，面對二十一世紀，能否植根儒家傳統，面對現代人存在的課題發出有哲學意義的洞見，這對我們是一個思想上的挑戰。因此這次我決定要來，擺脫了我自己的教課和研究論文，並且抱著一個學習的心情。雖然，在1967年，我曾經回國，在我的母校東海大學講過半年課，略題是“文化與社會”，全名是“文化認同與社會變遷”，也曾提出韋伯的問題，柏深思的問題。當時哈伯瑪斯所提出的觀點還沒有在國際學壇上受到重視。我曾跟柏深思讀過一段時間書，對他所

任哈佛大學教授近三十年。著有《行動理論和人的存在條件》、《經濟與社會》等。

3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1929年。當代德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著有《知識與人類旨趣》、《合法性的危機》、《溝通行動的理论》。

設想的一些現代化問題有所感觸，所以那個課是環繞著現代化等問題而提出來的。現在，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雖然在這二十多年中，我常常回國，但時間很短，有時甚至只有三、五天，最多不過一個星期，因此沒有機會去深入了解和親身經歷。當然，根據各種文字資料與媒體信息，我也片面地了解到現在國內的學術界，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對這些重大的問題所進行的反思，所採取的途徑以及運思態度。因此，這次機會對我是十分難得的。剛回國這三天，已有所獲。除了看到一些新資料，昨晚有機會讀到錢新祖先生在新出版的《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上的文章——〈中國傳統思想與比較分析的措辭〉。本來我打算先討論這個問題的方法學，有了這篇文章，各位可參考他所提出的觀點。他的觀點基本上和我相契，即從比較學的角度，從文化與語言分析的層次來了解這個問題的特殊性以及普遍性的內涵。

這個問題——即所謂植根儒家傳統，面對現代人的存在提出有哲學意義的洞見，是一個特殊的課題，而非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課題。在北美，絕大多數的學者對有關儒學的問題是很生疏的。譬如，我和我的同事、同研究宗教學的博士班學生討論主要宗教思想家，也討論黑格爾、韋伯的問題，威廉·詹姆士的問題，乃至最近有關宗教學的一些發展趨勢。這些類型的問題和儒學有聯繫，但他們對儒學乃至“儒教文化圈”都不甚了了。

在中國則是另一種情形。1980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做過幾近一年的研究，1985年在北大哲學系講過儒家哲學。梁漱溟先生1923年在北大開過儒家哲學年的課。後來他覺得北大的學生很有玩票的傾向，就不在北大開課，而在校外辦了一個研習班，每位學生收一塊大圓，結果反應很不錯，和在北大講的情緒完全不同。但那次講完以後(約民國十三、四年)，就再也沒有在北大開

設這方面的課題。

當我在北大講儒家哲學的時候，我感覺到一種強烈的異化感、疏外感(alienation)。開始時跟學生不太熟，就和現在的情形一樣，很少人發問，提出意見。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大家比較熟了，一些同學開始說，很奇怪，居然在二十世紀的後期，還有人提出這樣保守的、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大概杜先生是在臺灣受的教育，對五四的批判精神理解不夠，所以對傳統還是含情脈脈的。後來同學們發現我對五四以來的一些問題還是有所了解的，就進一步思考其原因所在，也許是因為在國外住久了，有一種落葉歸根的情懷，一種思鄉之情，才對儒家充分肯定。在國外講中國文化，你不能專講糟粕，因為你專講糟粕，最後連自己的飯碗也會出問題。所以一定要講精華，有意識地將傳統美化到最高的水準，即使和歷史現實有很大的距離也置之罔顧。但後來發現也不盡然，也可能由於西方社會經過高度資本主義的發展，碰到了許多中國大陸還沒有碰到的現象，很多異化的現象，很多感情上的失落徬徨，由於這個原因，使得像禪宗、印度的東方神秘主義、道教、易經、乃至風水這些原來已經在大時代浪潮的席捲下成為傳統渣滓的東西逐漸又在西方現代化後期社會發揮了一些感情上的作用。不管怎樣，這是對五四的批判精神了解不夠，或者有一廂情願的感情因素，由此，面對西方的現存條件而提出對儒學的研究。這種思考儒家傳統的取徑跟我們中國大陸的學生所面臨的時代考驗的關係不大。

可是問題相當有趣。歷史發展和學術發展的渠道以及問題的提出，常常是不可預期的。1985年在深圳所舉行了一個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協調會，會上有人提出文化的問題應不應該談。開始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難道文化作為一個範疇已經失去了它的特

殊的哲學意義了嗎？後來龐樸先生⁴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他說，從1919年到1949年這三十年，中國大陸有好幾百種以文化為題的書籍，特別的王雲五先生主辦的商務印書館，出了很多關於文化的東西。但是從1949年到1979年這三十年中，中國大陸出版的以文化為題的書只有一本，那就是蔡尚思先生⁵的反傳統意味很強的《中國文化史要論》。因此，這三十年的時間，由於中國式馬列主義的緣故，文化成為一個在哲學上沒有意義、在政治上沒有現實效用的範疇。因此在1985年重新提出文化問題的時候，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落伍了，又回到了傳統的老路。

事實並非如此。應該說，這基本上是對科學主義掛帥的馬列思想以及其所塑造的政治文化所進行的反思，在反思中暴露其局限性。因此，從1979-85年開始逐漸蘊釀成“文化熱”，即對文化的討論又重新成為中國知識界的顯學。1985年以後，至少有千種以上有關文化的書籍出版，許多主要系列專著大都和文化有關。而且，我可以這樣說，大陸的青年學者，特別是重點綜合性大學的精英，對文化的敏感度極高，對海內外不僅是中文的，而且英文的、法文的及德文的等各方面的文化都加以討論。這一點在目前中國大陸的學術界非常突出，即使和臺灣現在對文化問題感興趣的學術精英相比，絕不遜色。那些在文學、哲學、藝術上有創見的學者，最近幾年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領域裡貢獻很多，其主題都和文化有關。

4 龐樸，1928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專長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著有《帛書五行篇研究》、《儒家辯證法研究》、《沉思集》等。

5 蔡尚思，1905年生。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專長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中國學術史。著有《中國思想研究法》、《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中國文化史要論》等。